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鄭丞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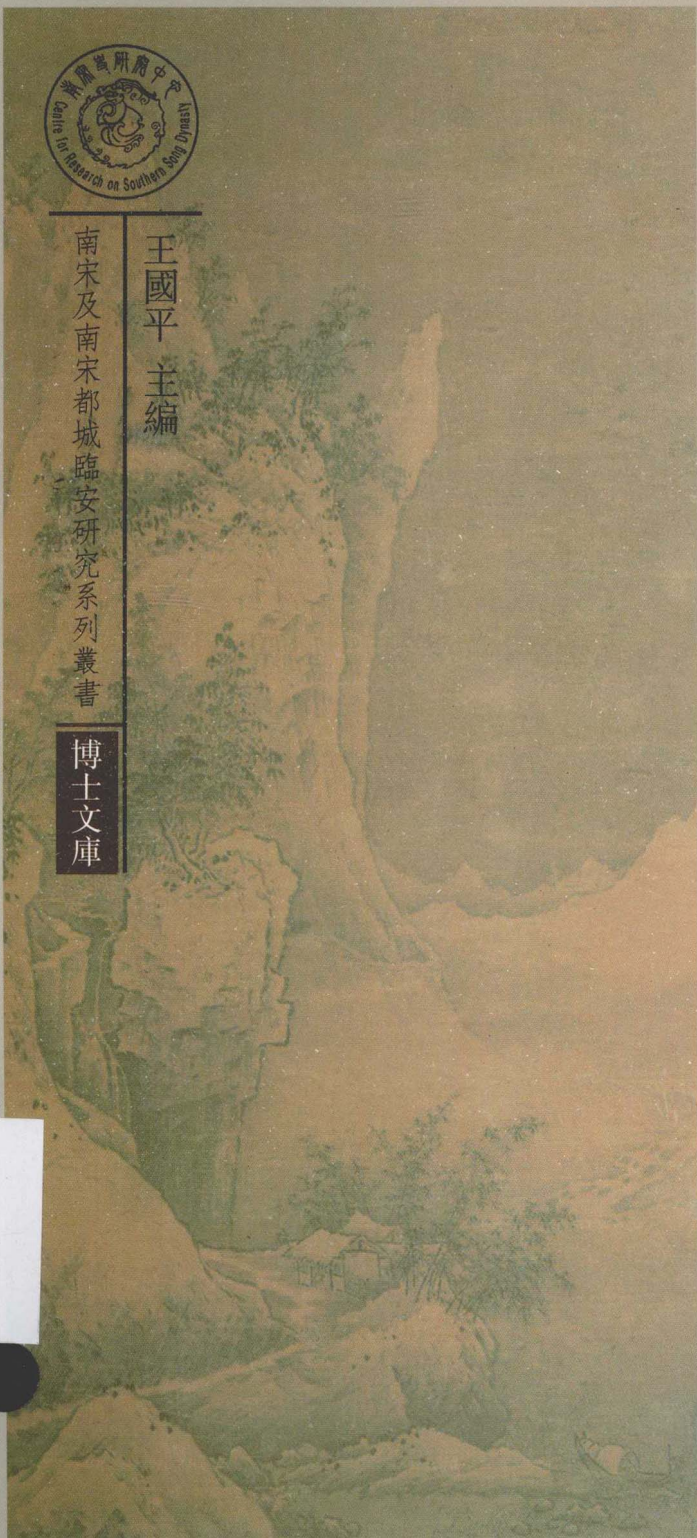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國平 主編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博士文庫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博士文庫

王國平 主編

鄭承良 著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 鄭丞良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ISBN 978-7-5325-6779-9

I. ①南… II. ①鄭… III. ①祠堂-研究-寧波市-南宋 IV. ①K928. 7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3) 第037715號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鄭丞良 著

責任編輯 陳麗娟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編: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發行經銷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印刷 上海顥輝印刷廠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15. 75

字數 233千

印數 1-1, 300

版印次 2013年3第1版 2013年3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325-6779-9/K · 1698

定價 46. 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編撰指導委員會

主 任 王國平

副主任 葉 明 翁衛軍 顧樹森 張鴻建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水照 方建新 史及偉 阮重暉 朱瑞熙
辛 薇 汪聖鐸 張其凡 何忠禮 李裕民
陳智超 周 膺 徐 規 徐吉軍 唐龍堯
曹家齊 魏皓奔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王國平

執行主編 辛 薇 何忠禮

執行副主編（以姓氏筆畫為序）

方建新 周 膺 范立舟
唐龍堯 徐吉軍

編撰辦公室工作人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曉寧 李 輝 魏 峰

序 言

徐 規

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欽宗之弟趙構在應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宋政權。不久，宋高宗在金兵的追擊下一路南逃，最終在杭州站穩了腳跟，並將此地稱為行在所，成為實際上的南宋都城。

南宋自立國起，到最終為元朝滅亡（1279），國祚長達一百五十三年之久。對於南宋社會，歷來評價甚低，以為它國力至弱，君臣腐敗，偏安一隅，一無作為。但是近代以來，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却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指出：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①

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更認為：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②

很顯然，對宋代的這種高度評價，無論是陳寅恪還是鄧廣銘先生，都沒有將南宋社會排斥在外。我以為，一些人之所以對南宋貶抑至深，在很大程度上是

① 《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 2001 年版。

② 《關於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1986 年第 2 期。

2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出於對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權相秦檜一伙倒行逆施的義憤，同時從南宋對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協，國土日蹙月削，直至滅亡的歷史中，似乎也看到了它的懦弱和不振。當然，缺乏對南宋史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衆所周知，南宋歷史悠久，國土雖只及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少說也有五千萬人左右，經濟之繁榮，文化之輝煌，人才之衆多，政權之穩定，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偏安政權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對南宋社會的認識，不僅要看到它的統治集團，更要看到它的廣大人民羣衆；不僅要看到它的軍事力量，更要看到它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看到它的人心之所向。特別是由於南宋的建立，才使漢唐以來的中華文明在這裏得到較好的傳承和發展，不至於產生大的倒退。對於這一點，人們更加不應該忽視。

北宋滅亡以後，由於在淮河、秦嶺以南存在着南宋政權，才出現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再一次給中國南方帶來了充足的勞動力、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生產經驗，從而推動了南宋農業、手工業、商業和海外貿易的顯著進步。

與此同時，南宋又是中國古代文化最爲光輝燦爛的時期。它具體表現爲：

一是理學的形成和儒學各派的互爭雄長。

南宋時候，程朱理學最終形成，出現了以朱熹爲代表的主流派道學，以胡安國、胡宏、張栻爲代表的湖湘學，以譙定、李燾、李石爲代表的蜀學，以陸九淵爲代表的心學。此外，浙東事功學派也在尖銳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形勢下崛起，他們中有以陳傅良、葉適爲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唐仲友爲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爲代表的金華學派。理宗朝以前，各學派之間互爭雄長，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二是學校教育的大發展，推動了文化的普及。

南宋學校教育分中央官學、地方官學、書院和私塾村校，它們在南宋都獲得了較大發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僅參加中央太學補試的士人就達三萬七千餘人，約爲北宋熙寧初的二百五十倍^①。州縣學在北宋雖多次獲

^① 《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三九。

得倡導,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兩宋共有書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十所^①,比北宋的三倍還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麗澤等書院,都是各派學者講學的重要場所。爲了適應科舉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鄉。學校教育的大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南宋文化的普及,不僅應舉的讀書人較北宋爲多,就是一般識字的人,其比例之大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峰。

三是史學的空前繁榮。

通觀整個南宋,除了權相秦檜執政時期,總的說來,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識政治和本朝故事,對國家和民族有很強的責任感,不少人希望藉助於史學研究,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以供統治集團作爲參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視文治,讀書應舉的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對史書的需要量極大,許多人通過著書立說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許多人將刻書賣書作爲謀生的手段。這樣就推動了南宋史學的空前繁榮,流傳下來的史學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過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家輩出,他們治史態度之嚴肅,考辨之詳瞻,一直爲後人所稱道。四川、兩浙東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都是重要的史學中心。四川以李燾、李心傳、王稱等人爲代表。浙東以陳傅良、王應麟、黃震、胡三省等人爲代表。江南西路以徐夢莘、洪皓、洪邁、吳曾等人爲代表,福建路以鄭樵、陳均、熊克、袁樞等人爲代表。他們既爲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史料,也創立了新的史學體例,史書中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對後世史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是公私藏書十分豐富。

南宋官方十分重視書籍的搜訪整理,重建具有國家圖書館性質的秘書省,規模之宏大,藏書之豐富,遠遠超過以前各個朝代。私家藏書更是隨着雕板印刷業的進步和重文精神的倡導而獲得了空前發展。兩宋時期,藏書數千卷且事蹟可考的藏書家達到五百餘人,生活於南宋的藏書家有近三百人^②,又以浙江爲最盛,其中最大的藏書家有鄭樵、陸宰、葉夢得、晁公武、陳

① 參見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十集,第111—115期,1929年12月至1930年出版。

② 參見《中國藏書通史》第五編第三章《宋代士大夫的私家藏書》,寧波出版社2001年版。

4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振孫、尤袤、周密等人，他們藏書的數量多達數萬卷至十數萬卷，有的甚至可與秘府、三館相等。

五是文學、藝術的繁榮。

南宋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繁榮昌盛的時代。詞是兩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據唐圭璋先生所輯《全宋詞》統計，在所收作家籍貫和時代可考的八百七十三人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李清照、辛棄疾、陸游、姜夔、劉克莊等都是南宋杰出詞家。宋詩的地位雖不及唐代，但南宋詩就其數量和作者來說，却大大超過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詩人曾幾、陳與義；有“中興四大詩人”之稱的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有同為永嘉（浙江溫州）人的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有作為江湖派代表的戴復古、劉克莊；有南宋滅亡後作“遺民詩”的代表文天祥、謝翱、方鳳、林景熙、汪元量、謝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以及戲曲等，都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南宋的民俗風情，宗教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對今天的中國也有着深刻影響。

南宋亦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說：“對於科技史家來說，唐代不如宋代那樣有意義，這兩個朝代的氣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義的，而宋代較着重科學技術方面……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①此話當然一點不假，不過如果將南宋與北宋相比較，李約瑟上面所說的話，恐怕用在南宋會更加恰當一些。

首先，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即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而言，在南宋都獲得了比北宋更大的進步和更廣泛的應用。別的暫且不說，僅就將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上，並製成為羅盤針使用這一點來看，它就為中國由陸上國

^① 《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中譯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家向海洋國家的轉變創造了技術上的條件，意義十分巨大。再如，對人類文明有重大貢獻的活字印刷術雖然發明於北宋，但這項技術的成熟與正式運用却是在南宋。其次，在農業、數學、醫藥、紡織、製瓷、造船、冶金、造紙、釀酒、地學、水利、天文曆法、軍器製造等方面的技術水平都比過去有很大進步。可以這樣說：在西方自然科學東傳之前，南宋的科學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封建社會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

南宋軍事力量雖然弱小，但軍民的鬥爭意志却異常強大。公元 1234 年，金朝為宋蒙聯軍滅亡以後，宋蒙戰爭隨即展開。蒙古鐵騎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軍隊，它通過短短的二十餘年時間，就滅亡了西夏和金，在此前後又發動三次大規模的西征，橫掃了中亞、西亞和俄羅斯等大片土地，前鋒一直打到中歐的多瑙河流域。但面對如此勁敵，南宋竟頑強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蹟。從中涌現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南宋軍民不畏強暴的大無畏戰鬥精神，他們與前期的岳飛精神一樣，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古人有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近人有言：“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前者是說，認真研究歷史，可為後人提供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以少犯錯誤；後者是說，應該汲取歷史上一切有益的東西，通過去粗取精，改造、發展，以造福人民。總之，認真研究歷史，有利於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也有利於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和諧、幸福的社會。我覺得南宋可供我們借鑒反思和保護利用的東西實為不少。

以前，南宋史研究與北宋史研究相比，顯得比較薄弱，但隨着杭州市社會科學院主持的 50 卷《南宋史研究叢書》編撰出版工作的基本完成，這一情況發生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改變。但歷史研究沒有窮盡，關於南宋和南宋都城臨安的研究，尚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也還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補。近日，欣聞杭州市社會科學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擬進一步深化和擴大南宋史研究，同時出版博士文庫，加強對南宋史研究後備人才的培養，對杭州鳳凰山皇城遺址綜保工程，也正從學術上予以充分配合和參與，此外還正在點校和整理部分南宋史的重要典籍，組織編撰《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

6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書》。對於開展以上一系列的研究,我認為很有意義。我相信,在汲取編撰《南宋史研究叢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系列叢書一定會進一步推動我國南宋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對杭州乃至全國的精神文明建設都有莫大的貢獻,故樂爲之序。

2010 年 11 月於杭州市道古橋寓所

前言

一、研究動機

紀念鄉里先賢人物在中國眾多傳統祭祀活動中具有深遠的淵源。本書討論南宋明州先賢祠，即是探討南宋兩浙東路明州（後改慶元府）地區（約是現今寧波、舟山羣島）紀念鄉里先賢人物現象背後之文化意義。雖然鄉里紀念先賢屬於中國傳統祭祀內容之一，而非出現於特定的時代與地區，但基於具體充實先賢祭祀研究與推進現有研究論述的需要，本篇論文選擇以區域研究的方式進行宋代先賢祠的研究。

試圖理解社會的構成、秩序的維護以及羣體的凝聚，是社會學者與歷史學者共同的關懷重點。自涂爾幹以下的西方社會學家，對上述問題不再僅以外在的控制力量來理解，而是認知到宗教的象徵、神聖本身具有社會力量的性質即是結合以及凝聚的基礎力量^①。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們也同樣意識到宗教在基層社會組織中的關鍵性，例如有關秦漢時期關於里社的討論^②。這些研究成果具體討論了宗教、信仰在基層社會中確實具有凝聚成

①（美）柯塞：《古典社會學理論》（中譯本），桂冠圖書公司1986年版，第98至第99頁。

② 相關討論參見勞榦《漢代社祀的源流》，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第11本，1944年，第49頁至第60頁。寧可：《漢代的社》，載《文史》第9輯，1980年，第7頁至第14頁。（日）土肥義和：《唐・北宋間の“社”の組織形態に關する一考察》，載《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下冊，汲古書院1995年版，第691頁至第764頁。

2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員、維護秩序、進行教化、社會救助等社會功能。

除了宗教活動在宋代基層社會的社會功能之外，隨着“基層社會”與“地方”研究視野的開展，學界對先賢祠也研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興趣。在討論傳統的“士大夫”與“國家”關係之外，學界逐漸認知到“地方”亦是理解宋代士人思維、文化現象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於是，宋代地方官學出現的祭祀各自先賢人物的先賢祠，遂成為學者討論宋代士人“地方”思維與活動的重要觀察對象。

學界從歷史脈絡來詮釋先賢祠，應當始自西方學者 Hymes 提出宋代士人由“中央化”轉向“地方化”的論述，官學先賢祠成為象徵南宋士人“地方意識”存在的事例之一^①。隨着學界重新檢討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論述^②，宋代官學先賢祠背後的複雜歷史脈絡，已非“地方意識”所能完全涵蓋。

此外，宋代先賢祠的相關研究多半強調理學運動的影響，這應與討論對象多是供奉理學家的祠堂有關。如此一來，研究命題自然緊扣理學運動的發展，以及理學家透過“先賢”建立的新人格“典範”。然而需要進一步省思的是，理學家透過官府與民間力量，積極推動在教育場所祠祀先賢，固然是促進宋代先賢祠發達的重要因素，但理學運動是否為審視先賢祠的惟一視野？除理學家積極倡行之外，不認理學的宋代士人是否即排斥設立先賢祠？答案似乎並非如此。可見在理學運動之外，應尚存更深沉的歷史傳統與思維，或隱或顯地在先賢祠堂設立過程與祠堂記文撰寫中展現。

面對學界現行兼具理論性與宏觀性的研究論述——地方意識與理學運動，選擇區域進行個案研究或許不失為一條檢驗理論的途徑。對區域先賢祠進行縝密的資料搜集、整理與解讀，至少可以避免理論過度詮釋的蔓延，並且具有展開宋代先賢祠多面向討論的空間。此外，選擇單一地區之先賢祠的研究方法，或許有助於梳理各種以先賢祠為中心的互動角色。諸如地

① (美)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包偉民：《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韓明士《政治家與紳士》與“地方史”研究方法》，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11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53 頁至第 672 頁。

方官員與地方士人、民間信仰與儒學思想、地方文化的維護與教化理念的散佈等，都是應當關注的對象。同時，由於與西方學者“地方意識”同屬“地方”之研究基準點上，所以區域先賢祠研究在審視宋代先賢祠之“地方”性質之際，或許能產生更客觀的研究成果，進而補充、修正現有論述與詮釋。

不僅如此，區域先賢祠研究可結合基層社會、祠神信仰、學術思想、教育場所、地方士人、地方文化傳統等各層面，建構“宋代基層社會中的先賢祭祀”的歷史圖像，提供深入基層的研究基礎。必須說明的是，“基層社會中的先賢祭祀”並非僅以“地方”作為觀察維度，而忽略“國家”對基層社會與先賢祠的影響與支配（如政治變化、理學運動、書院運動）。相反地，基層社會應當是一個開放而生動的空間，各種鄉里或超越鄉里的思維、勢力得以在此交錯與互動。

正是基於此研究認知，目前學界對南宋明州士人家族、學術、政治活動、鄉飲酒禮、社會經濟等豐富研究，不僅不是難以跨越的研究障礙，反而可能是理解南宋明州先賢祠與基層社會互動的重要資源，也更能有助於掌握明州基層社會各種力量對各級先賢祠的不同影響。簡而言之，同屬於儒學教育場所的先賢祠，基於州學、縣學、家塾、書院在基層社會不同的歷史脈絡，其附屬之先賢祠亦有不同的歷史意義。

二、研究回顧

由於本文涉及基層社會、地方士人、民間信仰、州縣官學與明州區域研究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此處無法一一羅列陳述，僅略為整理宋代先賢祠、明州區域研究與相關研究的基本成果如次。

（一）先賢祠研究討論

目前有關宋代先賢祠的討論，集中在州縣學校中的先賢祠堂，並非宋代基層社會紀念先賢的各式場所。Ellen Neskari 與山口智哉提供了宋代官學先賢祠課題較主要的研究著作。

Ellen Neskari “The cult of worthies: 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一文將宋代先賢祠置於政治、地方意識與理學運動的三大脈絡，提供了一個宏觀歷史形象。Nes-

4 南宋明州先賢祠研究

ka 對鄉賢基本性質的認知是：鄉賢不具有神格，與民間祠廟中祭祀的鬼神不同。文章雖然分爲“宋代地方先賢祭祀概述”與“理學運動之紀念祠堂”兩個部分，Neskar 的主要研究對象明顯是以後者爲主。整體上，Neskar 扣緊了宋代政治局勢發展、理學運動對地方先賢祠廟的影響。

首先，Neskar 認爲北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推動改革、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其儒家精神雖然有助於地方先賢祠堂的設立，但是却因爲過於關注中央朝政的改革，而忽略了對地方鄉賢祠興建的推動。Neskar 透過數據分析、圖表製作，說明新法人物當政時期有抑制民間祠廟發展的現象，但在高宗時期祠廟數量却有顯著的增加，遭受王安石、蔡京、秦檜迫害的人士多半取得先賢祠祀的資格。Neskar 認爲受到新黨在政治上壓迫的舊黨人士，比較容易在地方先賢祠廟當中取得位置，並據此說明新舊黨爭與政治迫害確實對地方先賢紀念祠堂發展有顯著的影響。

在先賢紀念祠堂的設立上，Neskar 認爲與地方精英階層關注目標的轉變有關。地方精英的關注點由朝廷轉向地方，積極扮演地方精英角色，關心地方事業發展，促進地方先賢祠堂的設立，呈現出地方精英階層的地方意識。其次，在紀念元祐先賢的興祠運動之中，學術上的聯繫也被視爲重要的興祠標準。孝宗時期，理學開始取得一定的地位之後，朱熹、張栻主張建立北宋理學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紀念祠堂。朱、張後學，尤其是朱熹門人，開始興築具有道統性質的、理學家色彩的先賢祠。理學性質的先賢祠普遍在各地興修，其背後意涵顯示整體理學運動的推廣、各個理學學派的師承關係。

南宋理學運動在慶元黨禁之後逐步取得思想正統的位置，不僅表現在先賢祠的紀念對象，同時也表現在孔廟從祀對象的更迭。王安石的退出、北宋理學諸子進入從祀之列，毋寧是最顯著的改變。Neskar 亦由先賢祠紀念者的安排，突顯了道統的繼承關係，同時也建構了全國性的地方紀念先賢之“在地”現象。

Neskar 觀察到這些先賢祠大部分是在地方官員和地方士人的主導下完成的，中央政府並未介入其中。宋代官學先賢祠既不屬於“國家”祀典層級，也與一般的民間信仰截然不同，其基本性質應當視爲地方官員與士人的祭祀

活動。南宋地方官員將先賢祠逐漸移至學校，便是爲了與民間祭祀活動有所區隔。^①

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一文，將先賢祠置於地方士人與官府之間進行理解。山口智哉認爲先賢人物的安排，反映出當下政治與思想的主張。在平江府學王蘋祠堂的例子中，則是看到王氏族人透過申請設立先賢祠，不僅得以維持家族聲望，還能獲得官方的經濟補助。在相關儀式、先賢位置等方面，先賢祠本身也蘊涵着地方士人的凝聚、“叙齒不叙官”與鄉里安全等地方秩序的象徵問題。^②

相對於 Neskar 與山口智哉以先賢祠爲討論對象，遠藤隆俊則是從蘇州范氏家族的角度，討論家族先人祠堂（即范仲淹的相關祠堂）與地方官府的關係。范氏家族在蘇州城內擁有歲寒堂和文正公祠、萬安山的文正公祠、天平山的忠烈廟和影堂等多處祭祀設施。其中，城中文正公祠與忠烈廟屬於官方建立。蘇州城內歲寒堂與文正公祠與學校義莊運營一體，形成官方支持、范氏族人負責運營的模式。^③

宋代書院中亦有祭祀先賢的活動，Linda Walton “Southern Sung Academies as Sacred Places” 一文，便是討論書院中的祭祀行爲。Linda Walton 認爲在空間規劃、制度安排、精神要求上，宋代書院與佛教寺院都有相似的地方。Linda Walton 認知到書院的祭祀活動具有深刻的經濟、社會轉化作用，最重要的是：書院透過祭祀孔子、門人、理學先賢的儀式，將在此就學的士人凝聚成一個羣體。書院祭祀的人物除了理學先賢之外，還有表現高超道德標準的官員、隱居當地的隱士等。

書院紀念先賢的祭祀具有“教化”的意味，是向釋、道、民間宗教信仰者爭取認同的形式。書院的設置往往也肩負向蠻荒開拓的功能。就書院位置

① Ellen G. Neskar, “The cult of worthies: 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New York: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② (日)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載《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第15號，2006年，第89頁至第111頁。

③ (日)遠藤隆俊：《蘇州の范文正公祠について》，載《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の伝統社會と家族》，汲古書院1993年版，第329頁至第345頁。

來看，書院與寺廟、道觀是處於競爭狀態。這點也表現在田產的爭奪之上。就官方態度而言，Walton 注意到政府同樣採用與寺廟、道觀、祠廟一致的賜額政策，作為管理書院的手段。不過，雖然官方在書院及其祠堂的修築上提供支持，但是官方似乎並未介入書院及其祠堂背後的象徵意義層面。書院社羣仍有賴理學後繼者在紀念先聖先賢的儀式中加以凝聚^①。

相較於宋代先賢祠研究成果，近年明清史學界對此課題的研究成果顯然相對豐富^②。趙克生《明代地方廟學中的鄉賢祠與名宦祠》，認為鄉賢祠與名宦祠經過明代洪武至弘治年間的推動，方才成為全國廟學特定的紀念祠祀活動^③。劉祥光《明代徽州名宦祠》、《明代徽州府學鄉賢祠》兩文^④與本文皆屬於特定區域先賢祠研究，故在研究方法上頗有值得參考之處，即使研究時代不同，但仍有簡述兩文內容的必要。劉祥光在《明代徽州名宦祠》中提到，早在南宋便已有“名宦”概念的產生。徽州府學名宦祠的確立，至晚是到明成化年間方才成型。關於名宦祠的人祀標準、過程、定期舉行的儀式，皆可看到地方官員與地方人士對鄉賢名宦祠的看重。相較於一般將人祀鄉賢名宦者視為抽象典範的存在，劉氏反而切入討論徽州當地面臨的社會實務問題，指出成化朝以後各朝人祀名宦者為多，是因為自此之後社會危機日益深化。名宦的人祀也表明了當地人對官員的期望，建構起名宦祠與當地歷史的交織關係。

劉祥光另一篇《明代徽州府學鄉賢祠》認為徽州府學鄉賢、名宦祠發展是地方士人與官員的合作結果，中央並無介入。官員想以興建鄉賢祠取代土地神祇的信仰，導正民風。地方士人推舉鄉賢難免受到地方勢力的影響，

① Linda A. Walton, "Southern Sung Academies as Sacred Places",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335—354.

② 針對明清基層社會與鄉賢祠的課題，詳見林麗月《鄉賢祠與明清基層社會》，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中研院·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7頁至第372頁。

③ 趙克生：《明代地方廟學中的鄉賢祠與名宦祠》，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1期，頁118—123。

④ 劉祥光：《明代徽州名宦祠研究》，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01頁至第176頁。劉祥光：《明代徽州府學鄉賢祠研究》，發表於“中國近世以降教育與地方發展”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8月1—2日）。

因而請託入祀鄉賢祠的風氣甚為猥濫。劉祥光經由分析申請入祀鄉賢祠的數篇呈文，說明入祀鄉賢祠的標準，不在於仕宦功績，士大夫在鄉里的作為才是考慮入祀與否的依據。

魏峰《從先賢祠到鄉賢祠——從先賢祭祀看宋明地方認同》認為宋代先賢祠入祀者不強調其鄉里的出身，明代鄉賢祠則可能受到官員致仕回籍規定的影響，鄉賢祠入祀者必為該鄉里出身^①。

由以上研究回顧可以發現，學界對宋代先賢祠的討論仍是相對鬆散，不如明清學界集中討論了鄉賢祠與地方士紳的互動。此一研究趨勢顯示宋代先賢祠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因而南宋先賢祠運動的本質與趨向仍未有令人滿足的解釋。本書即着眼於此，嘗試展開以下議題之探討：先賢祠如何與基層社會之士人文化、民間祠祀活動產生聯繫與互動，乃至於先賢祠如何受到理學運動、儒學復興運動之影響等，如此或有助於貫串理解南宋先賢祠朝向明代鄉賢祠、名宦祠的曲折發展。

（二）宋代明州區域研究

基於地方文獻相對豐富，明州因而成為南宋區域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這在社會經濟、士人家族、文化網絡等領域的研究表現尤其明顯。在社會經濟方面，宋晞《宋代明州州治鄞縣城鄉之發展》，討論了鄞縣的戶口、稅收與對外貿易^②。小野泰、成岳冲、西岡弘晃、周時奮等人討論了明州地區的水利工程，如它山堰與湖田問題^③。

① 魏峰：《從先賢祠到鄉賢祠——從先賢祭祀看宋明地方認同》，載《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第92頁至第96頁。

② 宋晞：《宋代明州州治鄞縣城鄉之發展》，載《宋史研究集》第20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0年版，第13頁至第25頁。

③ （日）小野泰，《宋代的水利政策と地域社會》，汲古書院2011年版，第143頁至第196頁。成岳冲：《淺論宋元時期寧波水利共同體的褪色與回流》，載《中國農史》1997年第1期，第10頁至第14頁。（日）西岡弘晃，《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水利》，福岡中國書店2004年版，第一部“中國近世の都市水利史研究”，第四章《地方都市の水利問題》第三節“寧波の都市水利と它山堰”，第107頁至第123頁；第二部“地域開發と農業水利”，第二章《地域開發と湖田》第二節“明州廣德湖の水利問題”，第242頁至258頁。周時奮：《它山堰研究》，收於董貽安主編《浙東文化論叢》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頁至第419頁。